

古代
散文
文體
概論

姜 涛 著

民出版社

古代散文文体概论

姜涛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古代散文文体概论

姜 涛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 字数: 294 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203-01200-X

G·526 定价: 7.40元

前 言

我们古代散文，源远流长，丰富多采，琳琅满目，作家众多，著作如林，真是浩如烟海，目不暇接。但散文之名，却较晚出。先秦至魏晋，散文虽为繁盛，却无散文之名。六朝有文笔之分，大抵有韵之文，是指诗歌一类；无韵之笔，即指散文而言。但仍无散文之名。唐代韩柳古文兴起，也只称“古文”，而不称“散文”。据我所知，“散文”一名的出现，当始于宋代。吴讷《文章辨体·诏》类序引南宋吕祖谦云：“近代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至明，“散文”这一概念才使用日繁。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两书，在论及各类文体时，则屡屡出现四六与散文对称，韵文与散文对举。直到“五四”以后，散文才和诗歌、戏剧、小说并称为文学四大部类。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古代，散文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散文，是指不重声韵，不事对偶，写作自由，单句散行的文章，如先秦两汉散文、唐宋古文即是。广义的散文，既包括上述单句散行的文章，也包括基本上是对偶的骈文，还包括押韵的辞赋，甚至包括押韵的箴铭颂赞。明清的一些古文选本，乃至近人的一些古文选本，也都是把骈文和辞赋包括在内

的。这也不无道理。因为骈文是散文的诗化，毕竟与诗不同。而赋则是诗化的散文，是介于散韵之间的一种文体。本书所称散文，姑从众说，当指广义的散文而言。

至于谈到古代文体，在古代也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涵义。一是指文学的风格流派而言，如永明体、上官体、西昆体等称谓即是。一是指文章的体裁而言，如论说、序跋、传状等即是。本书所论，即指后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的分类、研究，由简趋繁，由粗趋精，是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的。我国古代文学，早在先秦时代就非常繁盛，随之人们对文体的识别也应运而生。产生于先秦时代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我国最早的散文集《尚书》分别汇编成集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诗歌与散文的不同。再就《尚书》而言，所收虽同属文告之类的官方文辞，但其中却有典、谟、训、诰、誓、命等不同名称，这说明在编辑此书时，已经是根据某种标准，来划分散文的不同体类了。稍后于《尚书》的《周礼》，对某些文体也有所记述。《周礼·春官》说大史“小丧（卿大夫）赐谥。”小史“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谥。”从这一记载，始知周初卿大夫有谥有读。《周礼·大祝》有大宗伯大祝作“六辞”的记载：“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当作“辞”），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谏。”而现存《礼记》一书中，则有论述某些文体源流、性质、使用范围的文字出现。《礼记·檀弓上》，在记述鲁与宋交战，御者县贲父马惊，致使败绩战死，鲁庄公“遂谏之。士之有谏，自此始也。”《礼记·曾子问》进而解释说：“贱不谏贵，幼不谏长，礼也。”

惟尧乎称天以谏之。诸侯相谏，非礼也。”《礼记·祭统》爵夏进而对某种文体的命名、用途、性质作了较详解释：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居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象这些记述，虽不是专门论述文体之作，也称不上就是文体论，但已是文体论的滥觞，对后世的文体论是有影响的。

到了汉代，班固在刘向、刘歆父子《七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的基础上，开创了《汉书·艺文志》。在《艺文志》“诗赋略”里，把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和“杂赋”四类。于“杂赋”类中，按其体制和题材又分为“客主赋”、“行德及颂德赋”、“四夷及兵赋”、“中贤失意赋”、“思慕悲哀死赋”、“鼓琴剑戏赋”、“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禽兽六畜昆虫赋”、“器械草木赋”、“大杂赋”、“咸相杂辞”、“隐书”等十二种。这种分类，姑不论其是从目录学的角度分类也好，也不论其分类是否妥当，但他却致力于分类，可以说是在文体分类上的尝试。他在分类当中，又不曾加以说明，解释，当然也不能称得上文体论。继班固之后，东汉末年蔡邕在《独断》里，把天子下给臣下之文，分为策书、诏书、制书、戒书四类；把臣下上给天子之文，分为章、奏、表、驳议四类。也只有分类，而无所论，仍不能称之为文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这时，

由于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提高，文学的不断发展，新文体的不断涌现，于是便开始了对文体分类的研究。适如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所说：“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他道出了我国古代文体发展与研究的基本趋势。

至曹魏，曹丕兄弟出现，才真正开始了对文体的研究。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文论；在论及文学的地位、功能、作家的个性和作品风格等问题的同时，还论及几种文体。文中说：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
诔尚实，诗赋欲丽。

他不仅把诗文划分为四类（八体），而且概括指出了这些文体在写作上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要求。他在《答卞兰教》里，又论及赋、颂两体说：“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曹植在《上卞太后诔表》里说：“臣闻铭以述德，诔以表哀。”对铭、诔在内容上作了概括。

继曹氏兄弟之后，陆机《文赋》的出现，使文学批评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专门性的文论，也是最早的一篇创作论。它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渗透着自己创作的心得体会，在比较全面地论述文学创作的有关问题（诸如文学的基础、构思和想象、布局谋篇、内容与形式、遣词造句、音调声韵等）的同时，还论及文体，把文体分为十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他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

而譎誑。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显然，在文体论上比之曹氏兄弟又有了进展。他不仅指出了每类文体的基本特点，而且对各类文体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提出了总的要求。以上先秦至魏晋对文体的论列，总的说来，还只是片言只语，尚未能对文体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述。继陆机之后，便出现了论文体的专书，如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等，可惜均已失散，无从知其全貌。到了梁代，任昉《文章缘起》（或疑为依托），把文体分为八十四类。萧统《文选》分为三十七类，即赋、史、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刘勰《文心雕龙》则在前人论著的基础上，用二十一篇的篇幅，论述了三十五类文体。二十一篇，即：辨骚、明诗、乐府、詮赋、颂赞、祝盟、箴铭、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其三十五类，即：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刘氏对上述文体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可谓集文体论大成之作。继刘勰之后，代有论列。到了明代，分类之多，已登峰造极。吴讷《文章辨体》，分为五十九类；徐师曾《文体明辨》，分为一百零一类；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分为一百三十二类。可见从先秦迄明，文体分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致使人们眼花缭乱，不知所从。文体分得越来越繁杂，

这固然与文学的不断发展、文体的不断增多有关，但更主要的则是不辨文体的性质而乱立名目，或单摆浮搁而不知科学归类所致。文体分类杂乱，始于萧统《文选》。对此，前人多有訾议。清俞樾在《第一楼丛书》里说：“《文选》一书，辞章家奉为准绳，乃其体例，实多可议。如赋、诗宜以时代为次，多为标目，反或拘牵。且特立耕藉之目，而所录止潘安仁《藉田赋》一首，特立论文之目，而所录止陆士衡《文赋》一首，然则耕藉即潘赋之正名，论文乃陆赋之本义，题前立题，犹屋上架屋矣。又如风、月、雪赋之物色，义既不通，而《秋兴》一赋，又非其伦，斯亦义例之未安者乎？”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再如，《文选》把辞赋分为赋、骚、七、对问、设论、辞、符命八类，而其中之“七”尤为可笑。因枚乘写有《七发》，而遂立七体。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篇批评说：“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辩》亦可标为九乎？”又说：“《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篇，而《解嘲》当别有嘲体，《宾戏》当为戏体矣。……淆乱芜秽，不可殚诂（尽晓）。”可见《文选》文体分类之杂乱无章。这种随心所欲的分类方法，对后人分类愈演愈杂，也不无影响。直到清姚鼐《古文辞类纂》问世，才删繁就简，总括众体，而归之为十三类，即：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姚氏的分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分类优劣得失的基础上进行分类的。他在《词赋序》里就说：“昭明《文选》文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因

而他力矫前失，按文体的性质进行分类，这是比较合理的、科学的。所以继姚氏之后，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蒋瑞藻的《新古文辞类纂》，乃至近人王力先生论《古文体及其特点》（见《古代汉语》下第一分册《古汉语通论》）也都基本上依照姚氏的分类。本书分类，也基本采用姚氏分类，但对姚氏欠周之处，也有个别调整和弥补。诸如“书说”类，姚氏所收只限于书信和游说之士的说辞，而不及“论辩”类之“说”，本书则将“说”并入“论辩”类，把“论辩”改为“论说”，而另立“书牋”类。又姚氏不录正史之文，本书拟在“传状”类中补入正史之传记；正史中纪事之文，则另立“纪事”类，再者，由于姚氏囿于古文家的偏见，不收骈文，本书则补入之。经调整和弥补，本书所论，凡十五类（详见目录）。

从上述自先秦至明清对散文文体分类和研究的情况可以看出由简到繁，又由博返约的趋势。这说明对散文文体研究的不断深入，由不科学渐趋科学的发展过程。

写好某体文章，了解并把握某种文体的格局，是十分重要的。对此，前人尤为重视。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中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接着他对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等具体文体作了说明，而后说：“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强调了写文章把握文体的重要性。徐师曾在《文体明辨·文章纲领》中说：“文章以体制为先。”且引明陈洪谟曰：“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体者，文之幹也；意者，文之帅也；气者，

文之翼也。辞者，文之华也。体弗慎乃文庞；意弗立则文舛；气弗昌则文萎；辞弗修则文芜。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则文斯工矣。”陈氏从体、意、气、辞四者密不可分的关系上论述了写文章立体的重要性。明顾尔行在《刻文体明辨序》里，把文体比作陶冶之型范，方圆之规矩。他说：“陶者尚型，冶者尚范，方者尚矩，圆者尚规，文章之有体也，此陶冶之型范，而方圆之规矩也。”徐师曾在《文体明辨》里也说：“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官室之有制度（款式），器皿之有法式（固定样子）也。”他们都一致认识到立体对写好文章的重要性。这些看法，是有意义的。但是也有人反对对文体的研究，认为研究文体是徒劳无益的。如郑宾宇在《中国文学流变史·前论》里说：“他们这些分体的方法，不管分多分少，都是毫无价值，不过止于闹到一塌糊涂而止；怎奈一般修文学史的先生们也竟然依据他们的样儿，画起葫芦来！”这种指责不免偏颇，是毫无道理的。研究文体到底有无意义？回答是肯定的。依我粗疏之见，概括而论略有三端：其一、通过文体的研究，将会从中了解我国古代散文内容丰富多采，形式多种多样的情势。这种情势，任何国家都是不能与之比拟的，对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是有积极作用的。其二、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文体也是时代的产物。研究文体的产生、发展与消歇的状况，对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也是有所裨益的。其三、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发展而来的。今天的新文体，也是从古代的旧文体发展而来的。研究古代散文文体，了解各类文体的格局，把握其基本写作特

点和基本要求，从而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写作也不无借鉴意义。但就我们研究古代散文文体的现状来看，不是研究得太多了，而是研究得很不够，还远没有达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充分发挥作用的目的。所以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是我近年来在讲授“古代散文文体论”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的。书中对各类文体的论述，或详或略，不强求划一。大凡对今天借鉴意义较大者则详，如论说、传状、杂记等类；对今天借鉴意义较小者则略，如奏议、诏令、颂赞等类；对评价上尚存争议，而有一己之见者则较详，诸如辞赋、骈文等类；对争议虽少，而于今作用不大者则稍略，如赠序、箴铭等类。

本书所论各类文体，大抵是先论其渊源及其发展，次论其基本内容，复次论其写作要求及其基本特点。或按一体的发生、发展的自然顺序结合具体作品加以阐述。必要时，也指出在今天的借鉴意义。

本书于每类文体论述之后，还附录了前人的评述，除录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序》外，主要录梁刘勰《文心雕龙》、明吴讷《文章辨体序》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三家集文体论大成之作。其他众家，间亦录之。为读者提供研究时的参考，以免查检之劳。

本书在整理编写过程中，吸收了前人、近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又蒙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于此一并深表谢忱。编写本书，正值我身体欠佳，所以时断时续，时作时辍，花了很大气力，迄今才得以草成。再加之个人才疏学浅，又伏案未深，所以谈不上什么深入研究，只能是抛砖

而已。书中疏陋不当之处必多，诚望专家、读者批评赐教，以便在身体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

作者1987年孟夏谨识于沈阳

目 录

前 言	(1)
一、论说	(1)
论说之“论”	(2)
论说之“辨”	(19)
论说之“说”	(23)
论说附录	(33)
二、序跋	(39)
序跋附录	(47)
三、奏议	(50)
奏议附录	(54)
四、书牋	(65)
书牋附录	(85)
五、赠序	(87)
赠序附录	(97)
六、诏令	(98)
诏令附录	(112)

七、传状	(125)
传状附录	(158)
八、碑志	(160)
碑志附录	(177)
九、纪事(历史纪事)	(184)
纪事附录	(203)
十、杂记	(205)
人事杂记	(206)
名胜营造记	(226)
山水游记	(245)
书画器物记	(268)
托物寓意记	(279)
日记	(287)
杂记附录	(292)
十一、箴铭	(296)
箴铭之“箴”	(296)
箴铭之“铭”	(300)
箴铭附录	(306)
十二、颂赞	(311)
颂赞附录	(319)
十三、辞赋	(323)
先秦时期的荀、宋赋	(328)
两汉时期的古赋	(332)
魏晋六朝时期的骈赋	(353)
唐宋时期的律赋和 文赋	(365)

辞赋附录.....	(377)
十四、哀祭.....	(390)
哀祭附录.....	(403)
十五、骈文.....	(409)
骈文附录.....	(433)

一、论 说

论说，包括论和说。论，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议论文。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说明文。因为二者在性质上相近，故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立《论说》篇。今人也多仍其旧。需要指出的是，姚鼐在《古文辞类纂》里，不立“论说”类，而立“论辨”和“书说”两类。姚氏所立“论辨”类，实际上就是“论说”之“论”。所立“书说”类，实际包括“书信”和“说辞”两类。把“书信”与“说辞”归入一类，就性质而言，很少共同之点，实属不伦不类。本书则将“书说”类中之“书”，另立“书牍”类。将“说”并入“论辨”类，更名曰“论说”。在“论说”类中，名称颇多，这里就其最重要的论、辨、说三类加以论列。